

《四书评》辨析

任冠文

署名李贽的《四书评》一书，究竟是不是李贽的著作？近来颇多争论。由于该书对研究李贽思想有重要作用，所以有必要澄清这一问题。

今本《四书评》是对儒家经典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的评点，主要采取了眉批与段落后评的方法表达作者思想，其批点形式与李贽批点它书完全一致。按李贽万历十六年有信给焦竑讲“年来有书三种（即《焚书》、《说书》与《藏书》）……如得数年未死，将《语》、《孟》逐节发明，亦快人也”^①的说法，可知他确曾有过批点《四书》的打算。再据大约万历二十六、七年，他又给焦竑的信说：“《焚书》五册、《说书》二册……《坡仙集》四册、批点《孟子》一册，并往请教。”^②又知李贽当时已批点完《孟子》。《孟子》是《四书》的最后一种，看来李贽可能确实批点了《四书》。现在虽无法证实李贽批点的《四书》已经刊行，但从李贽自己所说“随手辄书，随书辄梓，不能禁”^③的情况分析，批点《四书》这样重要的著作，在当时一定也被刊行了。

当然不能说李贽批点、刊行过《四书》，就认定今本《四书评》是李贽的著作。因为李贽的书在他死后曾被官方几次焚禁，遭到损失。能保存下来与万历末年、天启初年其书大行有直接关系。当时“朝廷虽禁毁之，而士大夫则重镌版。”^④以至出现了一部分文

人、学士“全不读《四书》本经，而李氏《藏书》、《焚书》人挟一册，以为奇货”^⑤的现象。这对保存李贽著作与传播李贽思想虽起了重要作用，但也造成有人“动辄甲乙笔墨，乱其手泽，而托言卓吾（李贽）老子遗书”^⑥的现象。更严重的是“书坊觅利之人，见其刊之获厚赏也，每窃得先生抄稿，无有不板行者”^⑦。于是就出现了“真贋相错，非尽出其手”^⑧的情况。事实上也正由于此，早在明代末年就有人认为《四书评》不是李贽的著作。明末人盛于斯在《休庵影语》中讲：“近日《续藏书》貌李卓吾……又若《四书眼》、《四书评》、批点《西游》、《水浒》等书，皆称李卓吾，其实皆叶文通（明末人，名昼）笔也。”稍后其好友周亮工也说：“当温陵（李贽）《焚》、《藏》书盛行时，坊间种种，借温陵之名以行者，如《四书第一评》、《第二评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琵琶》、《拜月》诸评，皆出文通手。”^⑨以后，清修《四库全书总目》、近人余嘉锡著《四库提要辨证》全都沿袭盛、周二人之论，并未详加辨证。解放后，侯外庐先生在《中国思想通史》一书中最早提出了异议，他认为今本《四书评》“精神内容文字风格与李贽其它著作吻合”，“因此仍定为李贽的著作”。其后，崔文印、叶朗等先生提出不同意见，而刘建国、黄征等人又发文反驳。大致来讲，争论的焦点在两个方面：一，盛于斯、周亮工之说是否可据？二，今本《四书评》的思想内容是否与李贽一贯思想相一致？这两点正是搞清今本《四书评》真伪的关键，以下我们也从这两方面作些分析。

一、盛于斯、周亮工之说是否可据？

认为今本《四书评》不是李贽著作的同志都以盛于斯、周亮工的记载为依据，而二人所记是否正确呢？有的同志指出盛于斯“当生于万历二十七年左右，万历三十年李贽去世，大约过了五、六年，伪冒李贽的贋作就盛行起来，而盛于斯的青少年正当这个

时期，可以说他关于叶昼的记载都是耳闻目染，应当是可靠的”^⑩。叶昼穷而喜酒，“著书，辄为人持金鬻去”^⑪，他的书由书商借李贽之名而刊行是完全可能的。但仅因盛于斯生活在当时，就认为他的记载可靠，实难令人信服。因为当时李贽的好友焦竑等人尚在世，若叶昼伪造李贽的著作，他们是不会不予揭露的，而在今存刊行于万历四十六年的《续焚书》中对此却毫无反映。另外，盛于斯以为《续藏书》是叶昼的伪作，但《续藏书》有焦竑等人所作序，况且经考证虽不能说《续藏书》全出李贽一人之手，至少可证明其大部分为李贽所著^⑫。再者，就《四书眼》而言，盛于斯以为是叶昼伪造，而事实上叶昼在《四书眼·凡例》中已说明“先师（杨复所）与李卓吾不同道，而亟称卓吾……故其论次批评间多暗合”。并指出“此书与《四书评》同意者，已尽情删削”。可见叶昼并未伪造《四书眼》，他只不过是在为先师杨复所编纂遗著，而且态度严肃，他将《四书眼》与《四书评》“暗合”部分“尽情删削”，又怎么能说是作伪呢？他所讲杨复所与李贽的关系，也是事实。杨、李二人多有往来，相互佩服，杨复所“以原壤见推”^⑬李贽，称赞李贽是当时“善知识者”，并遣他的学生拜访李贽^⑭。在李贽与耿定向的争论中，杨复所还曾写信给周友山为李贽辩解。而李贽亦称赞杨复所是“大作家”，并将其视为自己的同道^⑮。可见叶昼所说杨复所“亟称卓吾”，当不是虚言。至于说杨、李二人学术上“不同道”，那是叶昼的认识。在学术问题上，同中有异是自然现象，无可非议。有人曾问杨复所“学与卓老同异？”他回答：“有什么同异？就是有不同，也莫管他。”^⑯李贽也曾称赞杨复所的学术“取成于心，非世儒矫强义袭，半途而废者比。”^⑰可见两人在学术观点上颇有相近之处。既如此，两人在各自批评《四书》时，有“暗合”之处，当不为怪。叶昼是杨复所的学生，为先师编定《四书眼》，不能说是作伪。他既然在编定先师遗著时，连其中与李贽《四书评》同意部分都删去，那又有什么必要再去伪造《四

书评》呢？看来盛于斯对叶昼伪造《四书评》的记载并不可靠，不能成为《四书评》是伪书的依据。

至于周亮工《书影》所记，更不可信。因为此书本是周亮工在牢狱中撰写的传闻与读书回忆录，张遂辰在《书影跋》中讲：“先生是编，成于清室，时简阅无书，就腹笥而成之，故有书影之称。”连周亮工自己也说：“吾之为此，不过是读书影子已耳。”^⑮既是“读书影子”，自然有许多内容不一定完全可靠，诸如“孔雀闻雷而孕”、“以油涂犬足日行万里”、“男骨白，女骨黑”等等，多为抄袭传闻谬说，不足为信。对于叶昼伪作的记载，更明显取自传闻，所谓“当温陵《焚》、《藏》书盛行时”的说法，不可能是自己亲见，因为他出生于明万历四十年，李贽的书盛行之时，他年龄尚小，大约只是在后来与盛于斯的交往中，有所听闻，因而在狱中加以记录。正因此，他书中所提到的《四书第一评》、《第二评》根本不见于任何史料记载，明显仅是凭人传闻所述。自然更不能作为《四书评》是伪书的证据。

二、《四书评》思想内容分析

在分析《四书评》思想内容之前，需指出由于明、清两代一直把李贽视为“异端”，将他的许多反传统思想说成是“非圣无法”。所以后人多把李贽当作一位反道学、反圣教的思想家。特别是十年动乱时期，更把李贽作为“法家”的代表人物，反孔、反儒的斗士。以至于给大多数人一种影响，似乎李贽确实反孔、反儒。由于这种影响，有些同志在分析今本《四书评》真伪时，不自觉地将其运用于自己的思维中，因而产生了误解。为此有必要先就李贽对孔、孟及儒家经典的态度作一说明，而后再对《四书评》思想内容进行具体分析。

1. 李贽对孔、孟及儒家经典的真实态度

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李贽不迷信圣人，他曾讲：“圣人亦人耳，

既不能高飞远举，弃人间世，则不能不衣不食，绝粒衣草而自逃荒野”^⑩，圣人既然也是人，那么“勿以过高视圣人之为可也”^⑪。《四书评》中这种不迷信圣人的态度也处处可见，如《四书评·论语·卫灵公》（以下所引《四书评》语，仅书《四书》名）第十九条“子曰：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。”后批：“必欲没世称名，也是个‘疾’。”《论语·季氏》第七条“子曰：君子有三戒：少之时血气未定，戒之在色；及其壮也，血气方刚，戒之在斗；及其老也，血气既衰，戒之在得。”后批：“酒色财气，孔子之训止戒其三。固知无量之圣，不知酒之当戒也。”这类批语明显是不同意孔子的观点，且其中不乏有嘲讽意味。《孟子》中这类批语更多，语气也更激烈。如《孟子·尽心下》第四条，孟子强调仁以服人，说：“有人曰：‘我善为阵，我善为战。’大罪也。”后批：“如此说来，善阵善战的却不是大扯淡！”《孟子·告子下》第六条记孟子与淳于髡对话，后批：“竟是相骂一场。”这些明显是对孟子观点的指责。但这并不意味着反对孔、孟。如前面所批“必欲没世称名，也是个‘疾’”，只不过是说圣人亦有不足，“欲没世称名”不过是“贤者之病”^⑫，圣人既然是人，有“病”也就不奇怪了。正因此，在《四书评》中，他常常说：“圣人亦只完得人臣之常”、“与大众一样”、“与大众亦只一样，所以为圣人”。圣人是人，人“能尊德性”便是圣人。^⑬所谓“尊德性”，不过是“率性而为”。讲得通俗些就是说话、做事都要实在，言行一致，有过不掩。所以他说“圣人不曾高，众人不曾低”^⑭，人人可以为圣。在《四书评·中庸》中，他一再强调“至诚”，他说：“至诚如神”、“只是一个‘至诚’便了得天地间无限事体，便做得天地间无上人物”，反映出了他一贯主张的圣凡平等思想。他虽然主张圣凡平等，但丝毫没有贬低和反对圣人之意，他眼中的圣人是最诚实的。孔子曾讲：“君子之道四，丘未能一焉。”以往多以为是孔子的谦词，而李贽却认为“彼自谓于子臣弟友之道有未能，盖真未之能，非假谦也。

人生世间，惟是此四者终身用之，安有尽期。若谓我能，则自止而不复有进矣。”^④所以在《四书评·论语》中，他说孔子“只有一个至诚”。孔子曾讲：“我非生而知之者，好古敏以求之者也。”又说：自己是“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”，过去许多人解释是孔子自谦语，而李贽却批道：“实话”、“全是实话，何曰谦词？”在他看来圣人是最老实的，正由于孔子最实在，所以才是圣人。孔子曾讲：“盖有不知而作之者，我无是也。多闻，择其善者而从之；多见而识之，知之次也。”李贽批道：“甘心为次，所以无上。”李贽在这里并不因孔子自己认为是“知之次”者，而贬低孔子，相反他以为这才是孔子“无上”之处。孔子之所以是圣人，正在于他的“至诚”。曾有人指出孔子的错误，孔子说：“丘也幸，苟有过，人必知之。”李贽连批“圣人、圣人！”可见李贽所谓的圣人并非完人，他并不因圣人有错而贬低他，相反他以为有错不讳正是圣人所为。《四书评》中所反映出对孔、孟的态度与李贽一贯思想毫不抵牾。

否定《四书评》是李贽著作的同志，将李贽《焚书·童心说》中讲的：“夫《六经》、《语》、《孟》非史官过为褒崇之词，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。又不然，则其迂阔门徒，懵懂弟子，记忆师说，有头无尾，得后遗前，随其所见，笔之于书。后学不察，便谓出自圣人之口地，决定目之为经矣，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？纵出自圣人，要亦有为而发，不过因病发药，随时处方，以救一等懵懂弟子，迂阔门徒云耳。药医假病，方难定执，是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？然则《六经》、《语》、《孟》，乃道学之口实，假人之渊藪也，断断乎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”的论述与《四书评》中所批“至言”、“千古至言”一类批语相较，认为二者反映出的思想是“南辕北辙，格格不入”^⑤。其实这是未搞清李贽对于儒家经典的真实态度。李贽并不否定儒家经典，他只是反对将儒家经典神圣化、绝对化，反对执定一说，认为“执定一说即是死

语，死语则如印印泥，欲以何用？”他指出：“经，言教也。圣人不得已而有言，故随言随扫，亦恐后人执之耳。”^{②⑥}正如《童心说》中所讲：“纵出自圣人，要亦有为而发，不过因病发药，随时处方”，是针对具体人、事而发的一时之言，岂可将其神圣化、绝对化？而当时的道学家正是以神圣化、绝对化儒家经典来为自己的虚伪张本，实际上是对儒家经典的亵渎。李贽并没有贬低儒家经典，《童心说》中所讲的主要也是揭露假道学的虚伪。与《四书评》中的某些批语表面看似矛盾，其实并不矛盾，前者是从总体上来说，后者是对具体言论的评价。这正是李贽对待儒家经典的客观态度，他不仅不是贬低儒家经典，相反是对儒家经典的负责。事实上，李贽的这种态度与王阳明对待学生私录自己言语的态度颇为相似。王阳明的《传习录》中记：“门人有私录阳明先生言者，先生闻之，谓之曰：‘圣贤教人，如医用药。因病立方，酌其虚实温凉，阴阳内外，而时时加减之。要在去病，初无定说。若拘执一方，鲜不杀人。今某与诸君，不过各就偏蔽蔽切砥砺，但能改化，即吾言已为赘疣。若遂守为成训，他日误己误人，某之罪过可复追赎乎！’”^{②⑦}王阳明这番话是对自己言论的负责，李贽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儒家经典，难道不也是负责的态度吗？又何谈是对儒家经典的贬低呢？事实上，正由于李贽的这种态度，有的同志在分析《四书评》时发现其中许多评语，过去认为是“对儒家经典的蔑视”^{②⑧}，其实“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孔夫子的顶礼膜拜”^{②⑨}。当然这些同志是在以此来证明《四书评》不是李贽的著作，然而他们无意之中从一个极端，走到了另一个极端。客观来说，李贽对待儒家经典既不是蔑视，也不是顶礼膜拜，而是尽力作出自己公正的评价。就这种态度而言，《四书评》反映出的思想与李贽的思想也是一致的。

2. 《四书评》具体内容分析

《四书评》一书所反映出的思想，不仅对孔、孟与儒家经典的

态度与李贽一贯思想相一致，而且其它思想也一致。限于篇幅，我们仅抽取《四书评》各部分少量批语加以分析。

《大学》首章眉批：“三纲领中，止至善为要，故抽而言之。”李贽在与马历山论《大学》时，也谈到：“《大学》之道终归于至善之至。”^{③①}对此他曾解释说：“明德者吾之所本有，明明德于天下者，亦非强人之所本无。故又示之曰：在于至善而已。无善无恶，是谓至善，于此而知所止，则明明德之能事毕矣。”^{③②}这正是对“止至善为要”的阐发。此章批眉另有：“八条目中，修身为本，故又抽而言之。”第八章后又批：“《大学》之本在于修身。”第九章后再批：“虽说‘齐家’，到底只说‘修身’，正谓家之本在身。《大学》宗旨，‘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耳’。”这种观点在李贽许多议论中都有表述，《焚书·答耿司寇》一文中，他指责耿定向“所讲者未必公之所行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讲”，是言不顾行，是“本乱而求末之治”。并说《大学》“‘壹是皆以修身为本’。此正脉也，此至易至简之学，守约施博之道，故曰：‘君子之守，修其身而天下平’，又曰：‘人人亲其亲、长其长而天下平’；又曰：‘上老老而民兴孝’，更不言如何去平天下，但只道修身二字而已。”他解释修身之所以重要，说：“苟不明德以修身，是本乱而求之末治，胡可得也。人之至厚者莫如身，苟不能明德以修身，则所厚者薄，无所不薄，而谓所薄者厚，无是理也。”^{③③}这些都是强调修身是《大学》的宗旨，显然《四书评》中对《大学》批点所反映出的思想与李贽思想一致。

《中庸》首章后批：“一部《中庸》，只是一个修道之谓教。”李贽在《道古录》中也曾讲：“《中庸》一书，皆圣人修道之教也。”^{③④}并说：“修道便是教，以人治人便是修道。《中庸》一书，皆教也。”^{③⑤}这不正是对“一部《中庸》，只是一个修道之谓教”的解释吗？《中庸》第九章“子曰：天下国家可均也，爵禄可辞也，白刃可蹈也，中庸不可能也。”后批：“许敬庵以为叹人不能中庸，看极是。”

对于“人不能中庸”，李贽有专门论述，他说：“天下无不能之人，人无不能之事，凡稍可致力，人争勉焉，则以可能故。若中庸者，费矣而隐；既已隐，则虽神眼不能窥。微矣又显；既已显，则虽神力莫能遏。其奈之何哉！故曰不可能也。”^⑤下文更指出，不仅百姓不能，圣人亦不能。在《焚书·批下学上达语》一文中，更明确地讲：“中庸不可能也。”这些议论显然相同。

《论语·为政》第十一条“子曰：君子不器。”后批：“‘下学而上达’便是‘不器’。”这一对“不器”的认识，正是李贽不同于他人认识的地方。他曾讲：“下学自是下学，上达自是上达。”“下学者，圣凡之所同。夫凡民既与圣人同其学矣，则谓满街皆圣人，何不可也？上达，则为聪明圣智，达天德之人矣。是以谓之曰：‘形而上’也，谓之曰‘可以语上’也，谓之曰‘君子上达’也。”^⑥在李贽看来，学而能上达者，才是“不器”，才是君子，否则皆是凡人。这正是对“‘下学而上达’便是‘不器’”的解释。《论语·学而》第十六条“子曰：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不知人也。”后批：“今人亦有患知人者否？”《焚书》中保存《李氏说书》大意最完整的一条就是《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》，其中讲：“能知人则能自知，是知人为自知之要务……知人则不失人，不失人则天下安矣。此尧之所难，夫子大圣人之所深患者，而世人乃易视之。呜呼！亦何其猖狂不思之甚也！”^⑦李贽批点《四书》是在《说书》刊行之后，既是批点所以不作详论。但其中对当时人的指责，强调知人之重要，却完全一致。《论语·子张》第十三条“子夏曰：仕而优则学，学而优则仕。”后批：“此言‘仕’、‘学’合一也，所以从‘仕而优’说起。”这种仕学合一的思想，也表现在李贽的其它著作中。他曾讲：“仕、学一也。仕何事？以行道为事。是故出而治国，则国治；出而平天下，则天下平，便是实学。学何学？以行道为学。是故修身则道行于身，齐家则道行于家，便是真仕。仕即是学，学即是仕。”^⑧这不正是对仕学合一的具体阐述吗？

《孟子·万章上》第二条，记万章问孟子，舜之弟象欲杀舜，舜逃回后见象，反而高兴，“舜伪喜者与？”孟子回答：“否”。后批：“舜之喜，谓之非伪喜，便矫性情。但其伪处，正与‘言必信，行必果，硁硁然小人’不同耳。此其所以终收底豫之化也与？”对此事李贽在《焚书》中也有议论，他说：“孟氏谓舜之喜象非伪喜，则仆实未敢以谓然。夫舜明知象之欲已杀也，然非真心喜象则不可以解象之毒，纵象之毒终不可解，然舍喜象无别解之法矣。故其喜象是伪也；其主意必欲喜象，以得象之喜是真也，非伪也。”^③这种以舜喜象为伪的认识，是李贽认识的独特之处。《孟子·万章下》第十七条“孟子谓万章曰：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，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，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。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，又尚论古之人。颂其诗，读其书，不知其人，可乎？是以论其世也，是尚友也。”后批：“知得方是友得，所以相知难也。不然，今乡国之士，何尝一日不颂诗读书？只为不知其人，尚未堪与古人为奴。”《焚书》中对此亦有同样的议论，说：“今诵诗读书者有矣，果能知人论世否也？平日视孟轲若不足心服，及到临时，恐未如彼‘尚论’切实可用也。”^④二者不仅对孟子“尚论”认识一致，而且文字也颇相似。

以上仅举出《四书评》与李贽思想一致的部分例子，其实整部书所反映的思想都与李贽思想一脉相承。《四书评》是李贽晚年的著作，但它并不象某些同志所说是李贽“向尊孔思想倒退的著作”^⑤。李贽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，《四书评》所反映的思想与李贽一贯思想毫不抵牾，无疑是李贽的著作。

注：

①《焚书》卷一《答焦漪园》。

②《续焚书》卷一《与焦弱侯》。此信提到了焦竑对《藏书》人物安排所提建议，可知《藏书》尚未刊行，又提到请焦竑审阅《坡仙集》，而《藏书》

刊行于万历 27 年，《坡仙集》刊行于万历 28 年，此时二书均已定稿，仍未行梓，所以推为万历 26、27 年。

- ③《续焚书》卷二《老人行序》。
- ④《焚书》卷末《黄节跋》。
- ⑤朱国桢《涌幢小品》卷十六。
- ⑥《续焚书》卷首《张鼐·读卓吾老子书述》。
- ⑦《李氏遗书》附录《马经纶·与李麟野掌科（都谏）转上萧司寇》。
- ⑧《续藏书》卷首《焦竑序》。
- ⑨周亮工《书影》卷一。
- ⑩崔文印《〈四书评〉不是李贽著作的考证》《哲学研究》1980.4。
- ⑪钱希言《戏瑕》卷三《赆籍》。
- ⑫见拙文《续藏书辨析》载《史学史研究》1998.1。
- ⑬《续焚书》卷一《寄焦弱侯》。
- ⑭《李温陵外纪》卷二《永庆问答》。
- ⑮《焚书》增补二《复焦弱侯》。
- ⑯《李温陵外纪》卷二《永庆问答》。
- ⑰《续藏书》卷二十二《侍郎杨公传》。
- ⑱周亮工《书影·周铭跋》。
- ⑲《李氏文集》卷十八《道古录》卷上，第十章。
- ⑳《李氏文集》卷十八《道古录》卷上，第十一章。
- ㉑《焚书》卷二《答刘方伯书》。
- ㉒《李氏文集》卷十八《道古录》卷上，第十一章。
- ㉓《焚书》卷一《复京中朋友》。
- ㉔《焚书》卷一《答耿司寇》。
- ㉕崔文印《李贽〈四书评〉真伪辨》《文物》1979.4。
- ㉖《焚书》卷四《书决疑论前》。
- ㉗王阳明《传习录》卷首《徐爱序》。
- ㉘《四书评》出版说明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.5。
- ㉙崔文印《李贽〈四书评〉真伪辨》《文物》1979.4。
- ㉚《续焚书》卷一《与马历山》。
- ㉛《焚书》卷一《答周若庄》。

（下转第 107 页）

《左传》与《国语》如同出左丘明之手，则用字习惯不当如此相异。《左传》如出于丘明，其用字习惯又不当与《论语》相同如此。

总之，从以上几方面论例看，《左传》在思想倾向、细节描写、语言风格、措辞用字等方面大多盖有孔子的烙印，因而，笔者推断，《左传》主体部分为孔子所作。《左传》与《论语》的“心心相印”互为表里，正说明《春秋》（“传”）是孔子“以史显志”之书。正因如此，孔子也有“知我”“罪我”之叹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江苏教育学院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曹月堂）

（上接 201 页）

③②《焚书》卷一《答周若庄》。

③③《李氏文集》卷十八《道古录》卷上，第十一章。

③④《李氏文集》卷十九《道古录》卷下，第七章。

③⑤《李氏文集》卷十九《道古录》卷下，第三章。

③⑥《焚书》卷四《批下学上达语》。

③⑦《焚书》增补二《复焦弱侯》。

③⑧《李氏文集》卷十八《道古录》卷上，第三章。

③⑨《焚书》卷二《与友人》。

④⑩《焚书》增补二《复焦弱侯》。

④⑪刘建国《也谈〈四书评〉的真伪问题》，《贵州社会科学》1983. 3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广西师大历史系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曹月堂）